

海外民族志： 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路途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1-0020-14

● 高丙中

[摘要] 海外民族志是世界人类学界的后来者的概念,也就是非西方的概念。中国人类学界直到进入 21 世纪之后才开展有规模的境外田野作业的民族志研究,这既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一种新格局的反映,也是中国发展自己新生的表述世界的“写文化”能力的一种表现。借助于海外民族志在方法、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以及各国的社会事实的基本资料上的积累,中国的整个社会科学将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关键词] 海外民族志;写文化;共同体知识生产;中国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潘蛟老师介绍我,在我听来,如果不事先说这个人是我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个老师是做什么的,一会儿公民社会,一会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会儿民俗学,一会儿人类学。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个主线,这就是关于民主的实现方式的文化基础。我其实直到博士念完都是在中文系,中文系是一个想得很空灵、说得很逍遥的专业。然后到北大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又开始作一些很实际的调查,和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关注他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念中文系的嘛,接受的都是精英意识,念庄子啊、唐诗宋词啊,总的来说比较超脱,比较精英主义。民俗学的训练也有,但都是书本阅读,都是从书本上去看老百姓的生活的表现形式。等到自己真正走到社会中去看,受到的冲击还是挺大的。中国要有那种现代民主的话,我感觉是一

* 此文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潘蛟教授组织的“人类学前沿讲座”系列之二(2009年9月11日)整理、修改而成。讲座由赵娅记录整理。感谢潘蛟、张海洋、Mary Scoggin、谢元媛、张金岭、杨春宇等同仁在讲座中的评论、讨论。



个很难的事。因为精英跟老百姓大家平等，就是说你的价值观我是承认的，换过来我的价值观你是尊重的，这样的关系不具备，社会就不可能有大家心悦诚服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因为在精英—百姓的关系模式里，有的人更加英明，或者说他掌握着真理，他永远是对的，另一些人吧，我们不说他永远是错的，但他经常是不能保证自己的对错的，往往需要指导。那你说大家怎么可能在这方面（像投票啊，公职的选任啊），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均值与平权呢？这总是被认为不现实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现象，归根结底是在文化上让大家有一个优劣（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观念。“社会”本来所指涉的就是有差别的领域，正是因为如此，共同体要在文化上建立一个大家可以相互尊敬，让人感觉大家都是一样的人的共识；大家的权利啊、义务啊是平等的，大家都是有道德、可以被信任、值得尊敬的同类。一个现代社会在基本价值上要有一个平台，我们相互之间都承认的平台，但我们中国不具有这样的文化状态。我做刚刚潘蛟老师说的那一系列事情，如对公民社会的关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在我自己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来参与和推动的。

中国很多不尊重人，尤其是不尊重普通人的现象是很常见的，比如总是有人说中国老百姓很愚昧。说他愚昧，一个原因是他的宗教信仰或日常生活中的仪式表现是精英看不起的。说他落后，他被定位在历史的过去，就是说他的思想是过去的，在价值和文化上，他与拥有先进文化的人不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些在文化上不尊重人的问题在现有的框架里是解决不了的，在今天的中国你要为中国的迷信和民间信仰辩护，说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是好的，没有一个人会接受这种辩护，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这样说话。近代以来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做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一些东西归类在迷信的范畴里面，让老百姓在思想上不得超度、不得超生。但是你到其他国家生活，不在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笼罩的地方生活，会发现宗教信仰是挺光荣、挺正常的，没有中国这样的现象。没有迷信与科学如此对立的话语，所以在中国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换一种语言说话。那么换一种语言的话，这个语言从哪里来？如何建立起来？这样就回到根子上。这个话语的建立，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取经”回来而建立的这样一个格局。现在我们要走出这个格局，最可能有效的路子还是到国外去。我们去西方，但不仅限于西方，并且更加不同的是，他们那个时候是去读书，把书本上的东西带回来，那我们现在到外面去看别人的社会，看他们怎么生活，怎么过日子，怎么样相处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就可以了。当我们对国外的人的普通生活有足够多的民族志个案的时候，我想迷信啊科学啊这套话语就可以被西方社会的现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所超越。这是一个可能的路子，但仍然不是一个容易的路子，这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大家做很多事情。

“海外民族志”作为话题：为何要讲“海外”，为何要讲“社会科学”

现在回到今天要讲题目上——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先要解释为何要讲“海外”，为何要讲“社会科学”。民族志就是民族志，在西方的学科分类里面就没有“海外民族志”这样一个概念。海外民族志是现代学术的后来者圈子里的一个概念，一个中国概念，但不限于中国，因为非西方的国家还是很多的。简而言之，“海外民族志”是一个非西方社会的概念。在西方，民族志本来就是作域外、海外、境外、国外的观察和记录的，“民族志”

的本意就包含着“海外”的意思，所以没有必要加“海外”这个修饰语。但是在中国，经过了我们的学科发展的主流时代后，我们只有加“海外”这个修饰语，才能区别我们今天在谈什么。国内通过参与观察这种方法来作研究，不仅限于民族学、人类学，很多涉及“社会”的学科都在用这个方法，但是核心的还是要靠所谓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在中国，在我看来很难区分，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在西方三者的区别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人类学都是作境内研究，没有作境外研究，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民族学就是人类学，人类学就是民族学，因为都是研究边缘群体、少数民族，他们的对象是重叠的，所以会觉得内部是没有分别的。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或跟人类学重叠的这几个学科都是以国内调查为本务的，这是主流。偶尔发生的境外研究，基本上不是体制的，它是很个别的人很偶然地去作的学术尝试，所以必须加“海外”才能和中国主流的民族志对象区别开来。

这是解释一下为何要讲“海外”，下面再说一下为何要讲“社会科学”。如果限于民族志与中国的人类学这种关联的话题，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学术范围或圈子里，它基本上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没有人会说民族志对于人类学的发展不重要，没有人不理解去海外作民族志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的意义。以“人类学”名义尽心尽力的中国学人作了很多的调查研究，译介了不少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由此培养了人才，建立了学科，积累了西方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文献，也由此具备了一些资料、人才、科研条件和体制内的机会让你能够去作海外的研究。所谓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在学理上、在我们的圈子里一点不成为问题。在中国恰恰是说把它们跟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这才是中国学界需要建立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的建立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中国人类学的主流现状，并且为这种改变提供发展的制度支撑。因为我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科设置、项目审批，并没有专门的人类学队伍来从事，往往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成员来审批你人类学的申请。在当前，必须让其他学科尤其是所谓强势学科的学人成为能够认识到海外民族志对中国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学）的价值的友军，我们才能有从事海外民族志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把海外民族志与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相关联，在今天的中国人类学界是一个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问题。

进一步说，民族志从人类学的扩展到社会科学的，还需要学理的解释。人类学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的科学。早期这些作人类学研究或者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人类学事业的学人是说要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学科，这就让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瞠目结舌，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科学要怎样去做，因为他有自己专门的领域，这个领域就已经是个庞大的研究对象和有艰难的任务。但是人类学真的是通过民族志建立起了学科的威望，支撑了它关于人的科学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人类学的这种获得经验材料的方式比其他学科都要精致——当然是指通过长期深入的参与观察而获得材料和认识的方式。

人类学或人类学民族志是诸学科中的一个，但是又限于一个学科之内。随着学科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类学的一般观念对其他社会科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是民族志这种方法为整个社会科学所吸纳。比如教育学对民族志的方法运用很多，关于班级、班级内部学生的构成。最典型的是威利的《学会劳动》。本来我们打算将它的版权买下进行翻译，放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后来被告知中文简体版的版权已经被买下。我们人类学圈子没人买，很明显就是搞教育学的人买过去了。关于工人的后代还是工人的问题的研究，其实布迪厄的好多研究也是关于职业的内部传承的。就是说人类学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其他



学科也可能纳入自己的基本著作。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说民族志的方法也为其他学科所用，或者被他们尊为典范，被他们的教育体系吸纳。民族志是一个多学科都在学习和使用的方法，就像统计学的方法一样，各学科都在利用、发展。所以人类学树立的民族志的这种范例为社会科学建立了在社会中作经验研究的规范，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是说民族志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整体观的方法论，比如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这有点像社会科学里面的学科分工，可是这恰恰又是通过专门的民族志来支撑关于一个社区的宗教、经济、政治的研究，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的分工，另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治学或经济学学科内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正是由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它建立起来的个案，让那些特定的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能够落实在一个完整的社区里面。如果没有民族志的方法，它们的学术成就的积累就会很不一样。所以说，要从社会科学的大范畴来看待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力，看待它的杠杆作用，或者说看到它作为基础性的学术积累的作用。

前面一部分是说民族志和人类学在中国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理解和承认，这是从功能的或功利的方面考虑。后面讲民族志为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支撑，是从内在的学理方面来说，不是说一个纯粹功利的东西需要你接受，而是说它真的是具有很高学术贡献的方法。所以要在“社会科学”的层次来说民族志的重要性，我们对民族志方法外在的功利和内在的学理都得有一个交代。

“海外民族志”作为话题：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正路

第二个板块还是来说海外民族志作为话题的意义以及它的实现路径。首先说“本土化”。比较早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台湾和香港，有李亦园、金耀基等先生已经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后来国内很多年也一直在说本土化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把这些现象作一个概括。为什么需要谈本土化呢？因为本土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确实需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做学术，理论是西方的，问题也来自西方，并且在一个时期经费也来自西方，导师或最终的导师也在西方；而我们中国学者能做的就是提供材料，对象在我们这儿，材料在我们这儿，经费的一小部分花费在中国，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我们一直以学生的心态和身份来参与。这个呢，我们社会科学刚重新起步的社会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香港、台湾的一些“人到中年”的学者觉得再继续这样做学问是不行的，既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也辜负了自己应该更好服务的社会，于是提出本土化口号与过去区隔，希冀开拓自己和共同体的学术新生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不是在短时期能够达到目标的。这就是本土化诉求的背景。

那么怎么去追求本土化呢？我们说研究的理论在国外，那我们把它变成理论在国内，但理论由谁来提出，国内谁提出的理论才能被学界和同行承认是理论，确实又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知识格局有点像产业分工，谁提供图纸、谁提供厂房，在学术生产里面也有这样的格局继承。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来概括、提倡本土化，究竟提倡的是什么，我个人能想到的是：学术乃全世界学人之公器。这是在一个抽象的、学理的和方法论的层次上说的。但是做学问的毕竟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共同体的同仁，他们必须在学术活动里提出自己的问题，体现本土的思想，例如吸纳本土概念应该是一个指标。仅就社会科学的本土概念来说，可以列举

胡先缙用的“面子”概念，乔健先生用的“关系”概念，还有其他学者使用的“孝”的概念。我在1995年前后还曾经想编一个华人学者把本土词语转化成学术概念所进行的关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集子，结果努力几次都没能让它出版。在当时，本土化最核心的是本土的问题和本土的概念。比如说，在西方的社会里，“孝”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社会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福气、运、风水等。中文固有的词语里还是有很多词语是可以转化为学术概念的。

不说批评式检讨的话，我们讲一点学理。中国人做学问应该是本土的，但用布迪厄的“学术人”的词来说，我们的人当然是中国人，做学术又是西学人，这是一个历史的逻辑使然。本土的概念，是汉语词，比如“关系”，但作研究还可能是在一个西学的体系里做。再说本土的问题，为什么说中国学界作研究的问题都来自国外呢？因为这些问题不像摘苹果，可以直接伸手从自家果园的树上摘下来。学术上的问题是以继承的方式产生出来的，人们是通过一个理论把社会问题筛选或表述成学术的问题。学术的问题是生产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整个过程都不是本土化诉求本身能解决的，这就反过来说明，这些思路能够把本土化作为一种意识支撑起来，但它本身没有办法解决和实现本土化，这就还需要别的一些路径。

然后我们再说国际化。国际化也是这几年国内学界谈论最多的话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引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队伍，可是这么庞大的队伍，它所生产的知识被引用的很少。国外有一部分人懂中文的，或者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当然会和中国学界有交流，会有引用的现象，但其他学科，比如我们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引用的就很少。这种现象就使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冷落，我们付出这么多，但不被国际学术界所关注，我们老老实实做了这么多年学生，怎么做的东西就是不被人看得上？这个时候国际化就在进一步鞭策我们，搞一些体制来推动国际化的实现，最有名的就是在国内的评价体系里过分强调SSCI和H & A CI的重要性。这两个引用索引把国外的学术期刊归为社会科学的、人文和艺术的两大类。中国一般大学的规定是如果有成果被纳入这两个数据库，即是说有文章在其中所列的期刊上面发表，就能够得到特殊的奖励。国内许多大学都按照教师发表论文的情况发奖金，通常把刊物分为不同的等级，按照级别评定奖金的多少。当然是SSCI和H & A CI比CSSCI要高一等。这是在以记工分的方式来兑现报酬，反过来刺激你往这些刊物上发文章。这种刺激体系，把刊物分成西文和中文两大类和若干等级，实施学术的行政管理。本来学术是应该由同行来评价做得好不好，现在转化成这样一种数字，这样领导也能知道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要不然领导不知道该把三居室分给谁，把两居室分给谁。所以它是一种易操作的行政评价体系。这样，同行评价就变得很次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种作法已经成为制度性支持的，不论有什么优缺点，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多年提倡的本土化产生一种否定的作用。

这是一个作法，还有一个是翻译。比如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果它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的英文版选入，那这个身价又会更高，因为他变成了英文，我们这个学术还是有文字崇拜的，那它的积分又会高一点。第三种是英文刊物，我听说国内多个机构在积极筹办英文的原创刊物。办我们自己的英文刊物，即使没有人订阅，哪怕是送给别人请人看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也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的策略，因为这代表我们在追求国际化。不过，送出杂志，有点后怕的是，别人接过我们的刊物，看了封面却并没有兴趣翻看里面的内



容。

这些方法都是追求国际化的方法，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样大手笔地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来运作的方法，有多大效果呢？它们究竟能不能将中国学术变成国际化的学术？如果不与一些根本的方式配套，这些方法的效果是无从乐观的，因为这些作法不过是在反复证明自己是边缘学术而已。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本土化和国际化诉求的种种方法都是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在国际上被承认的问题的。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问题，自然是要落在我们提倡的海外民族志的追求上来。只有海外民族志真正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中国的学术才能在国际社会被广泛承认和尊重。如果（海外）民族志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常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这种学术路子也不可能真正国际化。

“到海外去”：作为社会浪潮

前面讲这么多基本上都是在破题，我们现在讲“到海外去”。其实西方人类学在发展成经验科学，或者说研究者和田野资料获得者统一起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发展框架里面。大量传教士、商人在世界各地散布开来，并初步积累了一些游记、笔记，第一代人类学家已经能拿这些材料作研究之后，研究者才到海外去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获得资料的。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中能看到，当人类学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西方人在他之前在这个现场或到了现场。实际上，“到海外去”作为一个学术的导向已经是一个社会潮流。在中国，如果把“到海外去”作为一个社会浪潮，那么通过两个路径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说清的。

第一是物流。中国生产的商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最初我们把出口换汇作为国民生产优先发展的，因为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外汇购买，但我们又是外汇稀缺的国家，所以优先发展出口外贸。这个动力作用多年之后，外销已经发展到非常庞大，为国内消费的生产反而变弱，导致国内很多经济问题出现，这是后话。中国作为物的生产者在全世界各地体现，并且过度体现，相反中国人类学到世界中去的启动太晚了，对这个潮流的反应太迟钝了。

第二是中国的人流。中国人成为世界表象的消费者，形成了势头很猛的大众旅游。中国人一般是去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让我们去的话。开始的时候发达国家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去香港和澳门，一方面因为近，一方面也确实因为发达。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以外的政治和文化空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甚至是责骂的，但人就是很奇怪，对有些骂的对象反而很有兴趣去靠近和了解。就是说我们整个国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让我们对外部世界产生了高度的好奇心态和想象的热情，这些东西诱导我们中的有些人在有条件之后去验证和感觉，对不同世界去触摸，这样就形成了大众旅游这种对世界表象的消费。

不管是中国作为物的生产者，还是中国人作为世界表象的消费者，这种庞大数量和高密度的物和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跟进之间确实是有巨大的时间差，这样一个时间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的难堪、羞耻，或者用柔和点的话形容，是来得太晚了。“到海外去”作为社会浪潮已经离得很远了，急需我们社会科学跟进，而人类学要在其中做先锋。

“到海外去”：作为知识生产范畴

简明地陈述一下，到海外去从事特定的知识生产确实是时代的需求，我们需要在知识上回答我们面对的、身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表述作得不够也不好。我在这几年的几个人类学丛书的总序里面基本上在讲一个意思，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里面，通过观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资料之上的关于特定地方或文化的表述太差，以致整个社会科学所赖以建立的“事实”太稀薄。直白地说，我们没有做好的田野作业，没有利用好民族志方法，来呈现我们所关怀的、我们这个共同体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我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经验材料来支撑这些说法。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羸弱的地方，这个弱点给整个社会科学带来的问题是大家都在说话，但我们不知道对方话的真实性，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误解太多，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话不建立在分享共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民族志的方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说问题出在国内，同时恰恰是我们在国外田野做得不足，做得不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去做，反过来造成国内学术的这种现状。比如说，做民族志要学调查对象的语言，我们去苗族地方，人家会讲汉语啊，我为什么要花两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语言呢？他们讲汉语我不就得到材料了吗？有人说通过苗语得到的材料和通过汉语得到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这是后话，先拿到通过汉语能获得的材料，这是学术的底线，是经济的作法。我们说做田野至少要一年的周期，那我没有一年的时间，反正语言也畅通，我花几个月的时间把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都查了，可以留下时间做更多的事。就是说在国内做田野可以有許多变通、折中的方法来规避民族志的规范。但如果换为到国外去做，访谈对象不会讲汉语，研究者就必须学习对方的语言，就必须呆更长的时间，也就可能得到更多对社会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海外民族志成为整个学界之“必需”的话，反过来作为一个规范，就会影响国内民族志方法的使用。

在回答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时，在表述上要从道听途说回到现场审视，民族志的方法是必需的。下面是将中国的现场审视分两个分阶段来阐释。一个是1918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搞的“到民间去”，就是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因为自古以来做学问是做四书五经的学问，现在认识到日常的生活也是学问，这样的动力和历史趋向支撑中国现代以来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几个学科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时期。一直到我们能够把到海外作经验研究当作学界的基本构成，都当作第一个时期，当然中间也有起伏。“到海外去”从实践来说是一个新的趋向，在这之前也有个别人到海外作研究，比如李安宅先生作过祖尼人的调查，乔健先生作过纳瓦霍印第安人的民族志研究。但作为一个时代的运动，作为学界共同的事业，是这几年才启动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都有老师在关注，有心推动海外调查研究。如果把作海外华侨研究纳入范围，参与的那就更广泛了。不管怎样说，到海外去做民族志不是今天的说法，中国从开始有人类学，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确实因为各种社会条件，跟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关怀、跟内外各方面的因素，一起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尽管存在这样的格局，但还是应该看到，到海外去是一种长期压抑后的冲动。



“凝视”：作为学术范畴、学术活动

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知识生产，到社会中获得基本资料的所有学科都是要作社会调查的，都是要睁大眼睛看人看事的。但是中国的社会学科对“看”的方法论认识是很浮泛的，民族志方法对“看”的专业化发展并没有得到学界广泛的采纳。如果引入“凝视”，就很容易把民族志方法的“看”与一般的社会调查区别开。“凝视”是看的精致化，民族志方法是一般的社会调查的专业化。一般的社会调查可以走马观花，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盯着看。因为采用“看社会”的方法，中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得以在“引经据典”的国学之旁发展起来，在今天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要取决于“凝视社会”的能力。相对于对国内社会的“看”功，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社会的“看”就更朦胧了，大致上只是“远眺”。

康敏曾经向我们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定位：“我们不仅要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还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北外要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就是时代赋予北外的历史使命！”这样的表述提到要把外面的东西介绍给中国，把中国的东西介绍给外面，其中的预设是把关于社会的知识当作成品。我在这里要谈另一种知识论：一个共同体获得关于另一个共同体的知识，这个知识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现成的。

经验研究，“看”是核心机制，谁、如何“看”都是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出了一本翻译的书——伍迪维斯的《社会理论中的视觉》。他写整个社会理论的历史，从涂尔干重点写起，从视觉角度来看社会理论的发展和变化。他认为早期方法论关注的是 vision，看见的东西，看见什么东西、没看见什么东西，这个重要；但慢慢地就发展出另一个被学术重视的东西——visuality，即可见性，一个对象被看见之前必须具有可见性，即被看见的可能性，在可能性和被看见之间既有时间差，又有对象的差距。就是说能够被看见的和最后看见的有差距，能够看见的多，被看见的少，中间就有一个选择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个选择就把人为啊、主观啊这些因素给放进来了。所以知识就不能再被认为是用一个客观的方式所获得的，必须承认有很多主观的因素。所以经验研究的“看”是一个很关键的机制，站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什么人在看，如何看，看者跟被看者的关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知识生产的核心部分，而不像以前认为的，知识就是知识，谁来看都是一样的知识，真理被谁发现都是真理，谬见被谁说出来都是谬见。总而言之，这样的知识观念，就把“看”作为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核心突出出来。从民族志的角度来研究“看”与“被看”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把“看”转化成“凝视”。因为民族志确实是社会科学里面非常精致的、非常细心的、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观察”，所以用“凝视”能够把民族志的“看”和其他学科的观察、考察从词语上区别出来。

下面我就展开地谈谈“凝视”。

1) 在方法上，从关注知识转变到关注知识生产，所以需要把人的创造、现场、社会情境、社会条件都纳入反思的对象之中。

2) 在人类学中已经发展出很专业的“看”，即“凝视”。“看”的人作为主体，既是个人又是社会主体，这样就把人是“社会中的人”这一主要观念引进来。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既是知识关系，又是权力关系。

3) 亲临现场的社会知识（文化表述）必须以知识社会学、文化自觉为条件。

讲到这里，我可以把“海外民族志”的知识定位和规范作一个归纳。海外民族志是一个共同体的代表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对这个社会的“凝视”，是指一国的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规范：1)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说到的基本社会现实你都要尽可能地在场，要“目睹”、“见证”。2)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流，你看到了现象后有自己的想法，当地人是什么想法，你把你的想法和当地人进行交流，这是民族志的新的标杆。特别需要强调，你必须流利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因为当地人没有义务学你的语言。3)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因为社会的生产、文化活动大都是以年为周期的，还因为充足的时间有利于熟悉人事、掌握语言，尤其因为你才可与当地人之间产生持续的互动。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

若干要点 讲完规范，我们来讲一下共同体。海外民族志从个人的学术行为到它跟一个共同体的关联，就是你说去做海外民族志是带着共同体的背景去做的学术活动，不是单纯去旅游的，你承担着一个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在提出什么议题这样的期许和传达的使命走出国门。所以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在这里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认识上要有从个人主体到共同体主体的理念。

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有一个要点：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伴随品。比如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聊天，一些很有见解的司机如果有学术训练的话，他写的文章就又生动，又有见解，又能针砭时弊，又能提出很有见解的政策性意见，但是他就只是聊天，不能发表文章，这是个人性的。一个东西写出来是学术，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内部传阅，确实是因为它是共同体的产物、伴随品。

再把这个要点分解一下，共同体造就学人。拿人类学来说，由业余的人类学家到专业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就是由这个体制设定的专业职位。一个国家和共同体设定这样的职位，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而不是因为个人爱好，所以是共同体造就学人。再一个是共同体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体（读者）。为什么有的人的文章写出来有人读，不管是当下的人还是他死后的人来读，他心中都有一个预期的读者，这个心中的读者（群）是被作者想象为共同体的，或许有人说是国家共同体，有人说是语言共同体，还有的人说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各种各样都有，总之他毕竟要有一个共同体。再一个是共同体传承学术成果，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传承才是学术，如果没有传承，就不构成学术。

上面讲这些，都说明学术是共同体的衍生物和伴随品，反过来，学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的新生。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学术呢？因为共同体要有更好的延续，消减危机，展望发展的可能性，需要建立反思机制。这就需要专门的人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就把学术和共同体从另一个宽泛的角度联结起来。

在场的意义 下面再强调一下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在场的意义。我们整个学理上的论述是在强调走到国外做学术，“在场”非常重要，因为有这个信念，所以认为海外民族志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是必要的。我要强调学理上的申说。我把海外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分解成“我看——我看见——我认为——你接受”。“我看”是一切可能性能够发生的初始动作，“我



看见”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我认为”是在看的基础上形成的我的观点，“你接受”是后果，是知识的传播结果。那么凭什么别人要接受呢？为什么解释能够被相信呢？因为“在场”是一种知识可信度的要件。因为在场，就有所见，你能以此为据来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的想法。“在场——所见——我思——转化为你之思”，这是一个能够贯通的过程。在场者是一个主动者，是一个自信者，他的说法有说服力，并且他的说服力构成一种压力。比如一个美国学者谈论中国社会和一个中国学者谈论美国社会。一个美国学者在中国作过专门和长期的实地调查，但中国现在找不到有同样研究经历和研究实例的中国学者，可能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但这是在普遍情况下作的假设，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学者在中国作调查。这种情况下他来谈论你的社会和你谈论他的社会，这个可信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在场和不在场所体现出来的可信度和压力是不一样的。

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成为世界普遍主义思维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就是说西方在当今世界各领域里是一个主动者，这个主动者是以它普遍主义的表述为支撑的。如果还是以“在场”来评述的话，西方的学术实际上就是全世界的在场，就是由这样的生产机制来支持的，所以当它们标榜普遍主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有他们经验的东西在里面的。我们今天要标榜普遍主义的时候，不管逻辑和学理的支撑是什么，经验的支撑就会有缺陷，因为你一直在一个太自成一体的体系里面，在其他地方你不出现，作为经验研究者来说这就是差距。所以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差别就是：在场者编织故事，不在场者传讲故事。在场者通过实地调查建构故事，然后你们拿去传，当然你传的时候可以改变，可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渊源还是只有一个，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東西在里面起作用。

叙事的意义 讲作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还需要谈叙事的意义。在我们正在出版的“走进世界丛书·海外民族志大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的“总序”里面，我对叙事的意义有文字的陈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一下。民族志是共同体对共同体的表述地位、能力以及主体性明确程度的知识证明。我们拿民族志来讲共同体和共同体的关系，在前面很多例子中我都已经提到，一个共同体跟另一个共同体，谁是主动者，谁是被动者，民族志的表述可以有指标的作用。你看两个共同体的民族志的关系，你就能够知道这两个共同体是什么关系。你也可以引申出来说，他之所以是这种表述关系，就是因为共同体之间是主动者和被动者的关系，所以民族志是申说者和被申说者、充分的申说者和尚未发育充分的申说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因为在共同体互动中，这个叙事关系的建立真正地、长期地维持了这两个共同体的关系。因为一朝一夕这种时间的变换总是过眼云烟的，但通过文字和表述所建立的文化的、心理的关系，才是支撑、维护两个共同体关系的要件。

一个共同体在关于世界的叙事中所占的位置，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是关联在一起的。这是上面那个立论换一个说法而已。上面是讲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这里是讲一个共同体和若干共同体之间在世界中的关系。你怎样表述世界，你怎样被世界表述，它是影响着、支撑着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

下面分别以西方和中国为例来说明。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作为表述中心，与世界（观）中心是同一的。西方是一个表述中心，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由西方建构起来的，是以西方为学术的中心建立起来的，西方也就是世界和世界观的中心，这两个中心是同一的。很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是，这种同一性在人类学界一直被检讨和批评，至少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在反思和批判。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世界却是另一种关系。在世界上，关于我们的表述与我们的自我感觉是异质性的。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述跟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感觉和认知差别是很大的，所以今天中国在面临外部批判时的辩解会显得那么苍白，就是因为两边的异质、相当大的异质的表述造成的。很多内部和人本身的扭曲现象也可以归结到这个异质性表述的问题上来。

前面讲的这些让人觉得没有希望、不可改变，但恰恰是这种共同体关系，不管是一个共同体对另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共同体对其他许多共同体，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在世界之中，确实确实有一个再结构化的机会。

共同体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 第一个是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义得到深刻反省，这种人类社会的权力的、思想的格局，西方本身也在不断反省。其实我们今天谈中国能有机会在世界做一个叙事者、做一个民族志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力于西方学者对自己学术体制的反省。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世界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这确实是一个现实。如同我们前面所讲，西方本身在民族志里面进行反思的维度，比如近几年提倡的合作者民族志，提供一个新思路：我到非西方世界作调查，在写出来的东西中我本人就是 author 吗？本人就拥有 authority 吗？民族志是我和当地人合作所产生的东西，从当地人本身也在成为表述者有机体中的一部分，到他自己成为表述者这中间只有一步之差，这是西方提倡主体性哲学内在的一部分。所以更多的共同体能够成为表述者，这也是一个历史趋势。

还有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一面之辞而成立。原来，人类学家到异国他乡做调查报告，不管他说当地怎样，都因为距离太远和交通不便而难以有人去验证，但现在不一样了，两边的人都是有走动、有联系的，能利用新技术很方便地联系上。好多民族志作者和当地人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村里面的很多情况都能及时了解。我们团队里的人在国外住在房东家，现在房东来中国旅游又住他们家了。就是说现在依赖新技术、交通、人口流动等所建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一面之词了。民族志现在必须是交流的、讨论的，或者说是能容纳各种表述者的方式。

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关于世界的表述，以前可以说是以西方为中心，现在属于西方跟非西方大家共同的表述，一个相互交流所产生的总的效果，一个世界公众的印象集合。

中国学者群作为后来者的遗憾与优势 遗憾就是差得还很多。比如我们要到泰国去作研究，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美国、英国学者在泰国作过研究了。我们没有办法把美国、英国所有关于泰国的民族志读完之后再去做研究，而美国、英国本身的学生，不说读完全部，他起码可以读完大部分再去作研究，这是我们作不到的。这是我们的遗憾，但恰恰我们又有我们的优势。关于泰国，中国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角度，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能为你提供的，只有中国学者去找才能找到。关于泰国，美国、英国学者是一种向度的表述，只有加了中国人，又加了印度人，甚至加了马来西亚人、缅甸人的表述，当然还有泰国自身的表述之后，这样构成的关于泰国社会的表述使得泰国这个文化共同体和以往相比是很不一样地呈现在



人们面前。所以说，关于社会的任何学术都是有所失的“得”。

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

讲这个问题时我把中国社会科学再作一个区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关于中国、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这种定位的性质是守着中国，也只关心中国，也只站在中国，只在中国作研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到自己关注的社区作调查外，像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这样的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是到所谈论的地方作过实地调查之后再来做学问。也就是，民族志从人类学、民族学特有的方法发展为所有社会科学所通用的方法，只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才会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即是一种有普遍主义关怀、有全球意识、有人类情怀的学术，它只不过是在中国、由中国的学术群体在做，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体制支撑下，可能那时中国体制下的学者已经有泰国人、英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是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做社会科学，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

我是觉得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多重属性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比重太失衡了，中国社会科学太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了，太少意义上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了。我们相信，这个比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调整。不过，如果没有海外民族志的普遍化，这是不可能的，这种调整的机会、这个杠杆、这个动力的轮子还是在海外民族志的方法和规范上。

概括地讲，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中国将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人讲述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的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相视”，于是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相视而笑”，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凝视世界：从集体的欲望到学术人的民族志行动

最后讲的一点是回到行动上来，讲“凝视世界”，从集体的欲望到学术人的民族志行动。走出去看世界，确实是共同体所需要的，但需要的落实依赖学术人展开行动去“做”。我想在这里把人类学的魅力和它同时要具备的两个特点作一个陈述，这个陈述对我们议题的支撑很关键。

人类学是一门思想的学问，也是一块行动的天地。人类学的思想是要“做”来支撑的。一国之人人类学是靠“做”做出来的。就是说你要去做田野，到处去做田野。如果没有田野的东西，没办法形成一个既有哲学深度，又具有经验意义的民族志著作。

民族志是集体欲望的个人表达形式。我刚说了，学术是一个共同体的属性，它确实代表了集体的欲望，是以个人来表达的，所以个人从事的民族志集合起来，构成共同体的表达形

式。

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他们提供远见与洞见，也提供获得远见与洞见的思想方法。人类学者也是知识群体的脚板子，他们代表这个群体去远行。人类学能走多远，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才能走多远。人类学家能够看多远，看多仔细，代表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就能够看多远，看多仔细。可以说，人类学家都没有来过的地方，社会科学是说不清楚的。人类学家在社会科学里面作为有思想、有哲学支撑的经验研究的先锋，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角色是需要社会科学界明白理解和认同的。

我们的一些行动 最后汇报一下我们北大人类学圈子都做了些什么。到2009年秋季，我们先后在12个境外社区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作业，其中，博士论文已经答辩了的人有5个，他们是做泰国的龚浩群、做马来西亚的康敏、做印度的吴晓黎、做澳大利亚的杨春宇、做美国的李荣荣。做完田野，论文还没有完成的，有做法国的张金岭、做德国的周歆红、做香港的夏循祥、做蒙古国的宝山。还在作田野调查的有林幸颖（做台湾）、马强（做俄罗斯），准备进入田野的有章邵增（做巴西）。

粗略一看，全都是散兵游勇，这么大的世界，我们的田野点只点缀在其中几个国家。人类学的作业终究会归入一些分支学科，比如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或者说地区研究，如东南亚研究、印度研究、澳洲研究、欧洲研究、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实际上我今天的谈话中没有涉及人类学研究中的地区研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有多重要，今天没有专门讲，但在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里我们是谈到了的。

海外民族志的若干组合意义 虽然我们只有12个点，但可以有很多组合，今后会在中国产生一种知识建构的可能性。

第一个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比较研究。大家可以从这几本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我们对当地人的结社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当地人除了亲属关系、乡邻关系之外，在一个政治共同体里面还和其他人建立可通用的、平等的关系。就像我最初讲到的我的学术关怀：怎么样在中国的文化价值平台上建立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念。我们推动同学去做田野也是在这个架构之下的。

第二个是金砖四国的比较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在作印度的、俄罗斯的、巴西的调查研究，我们本身又是做中国的，这就在格局上导向金砖四国的比较研究。

第三个是比较宗教研究。我们的调查点有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东正教的、印度教的，世界的主要宗教我们都在努力涵括。

第四个是不同政治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关于中国文化在整个近代以来的遭遇，在中国大陆本身来看是有局限性的。你看台湾、看香港，因为我们是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把大陆地区与之相比较的话，还是会得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来。

第五个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把对西方的学问、书本的介绍当作要务，所有的流派我们都介绍过。但是西方社会普通人怎么生活，一个有宗教的现代社会何以存在，一个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社会怎么可能，一个主张个人自由的社会怎么样是个有秩序的社会，所有这些关于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基本面，我们有经验研究吗？我们能够给出一个知识界提供了充分事实的民族志讨论吗？我们在知识上都是缺位的。比如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的早期，一定要把宗教去除，认为宗教都是落后的、骗人的东西，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



作过这样的研究：是不是有这样的社会，它没有宗教也能存在？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先驱已经见识过这样一个可供我们学习的社会？涉及很多人幸福和人生的宗教，你说给人戒除就给人戒除了，戒个烟还那么难呢！这个后果多严重啊！如果我们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同时就有一个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的研究，那么中国的社会决策，关于社会如何建构、如何可能的这样的基本的思想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说话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是太迟了，但永远都不会太迟，迟到总比不到好。我们现在来补这个课，最起码可以避免下一个历史阶段再干另外的傻事。

我们的海外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已经出来三本了，分别是龚浩群的《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康敏的《“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吴晓黎的《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我想把封面给大家展示一下，都是以特定地区的人群体貌、服饰、建筑和政治文化标志组合的图片。我想说，中国的社会科学所能够直观呈现的世界文化景观，都表现在这些封面的集合之中。我们把这些封面铺陈在一起，我们的社会科学就呈现了新的世界文化景观。

[收稿日期] 2010-01-04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 ~)，男，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1

Overseas Ethnography: An Approach to Develop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Gao Bingzhong

Abstract: "Overseas Ethnography " is a kind of concepts developed by the late comers in the worl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i. e., a non-European concept. Ethnographic researches based on fieldworks in overseas societies began after the coming of 21th century in Chinese anthropology. The new phenomenon is a refle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apability of writing cultures of the world. Base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methodology, concep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and materials of social facts of the global societ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ill find new road to their developments.

Key words: overseas ethnography, writing cultur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communit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上接 P. 86)

An Investigation 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of the Tajiks in Tashikuergan County

Liu Yuping

Abstract The Tajiks in Tashikuergan County, Xinjiang region, have comparatively preserved their language wel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education, the language storehouse of the Tajiks has been enlarged. Many people become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In the seat of Tashikuergan county governmen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using Tajik, Uygur and Chinese languages. Their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ir mother language will contribute its preservation, and their high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is beneficial to Chinese teaching.

Key words: The Tajiks,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s